

鲁迅文学中的佛学思想影响刍议

黄大年

鲁迅曾感叹过：“释迦牟尼真是大哲，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，真是大哲！”当然要想获得真知，也要磨练一番识别筛选的硬功夫。所以具有科学见识的一些文学家，思想家，并不拘于“佛说正义”，而是吮吸其中的滋养。如鲁迅在他母亲六十寿辰时，为其母刻的《百喻经》，原经义在于“譬喻说法”，而鲁迅在刻印时只取其譬喻部分。鲁迅在《痴华鬘》（即《百喻经》——作者注）题记中曾说：“今则无阿伽陀药（即不死药——作者注），更何得有药裹，出离界域，内外洞然，智者所见，盖不惟佛法正义而已。”说的正是此意。因此鲁迅把他研究佛经中获得的知识，曾大量地应用于文学创作，社会批评以及对敌斗争中。这种借鉴、创造，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第一、佛学的研究，有助于他对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研究，特别是对南北朝小说的研究与考证。

在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曾考证出汉朝六种小说，它们分别是：《神异经》、《十洲经》、《汉武故事》、《汉武帝内传》、《洞冥记》、《西京杂记》，均为后人所做，谬托汉人。其中《汉武故事》、《汉武帝内传》的考证，就有赖于他对佛学的研究。他说，谬托班固做的《汉武故事》、《汉武帝内传》则与班固别篇文章，笔调不类，且中间夹杂佛教语——彼时佛教尚不盛行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——可知也是假的。”

他也谈到了“六朝志怪的小说”之所以“更加发达起来”是与印度的佛教输入有关。他说：“因为晋、宋、齐、梁四朝，佛教大行，当时所译

的佛经很多，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，所以当时合中、印底鬼怪到小说里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。”其书有出于文人者，有出于教徒者。”如谬托张华撰写的《列异记》、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、王嘉的《拾遗记》、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等等。又有：“释氏辅教之书”，如刘义庆的《宣验记》、王琰的《冥祥记》、颜之推的《集灵记》、侯白的《旌异记》等。同时，他又举出宋人吴均做的《续齐谐记》中“阳羨鹅笼之记”为例，以证明有些思想源于佛经。其文记载：许彦行于绥安山中，遇一年轻书生，求寄许的鹅笼中。入笼中，书生不变小，如双鹅，鹅亦不惊，笼亦不重。后书生出，口中吐一年轻美丽女子，女子又从口中吐一年轻男子，男子更又从口中吐一妇人，相与戏谈。后逐次还入口中，书生遂与彦别。鲁迅说：“此类思想，盖非中国所故有。”又说：此故事已为段成式证明，出于印度的“释氏《譬喻经》”。但鲁迅又进一步证明“此一事，则复有它经为本，如《观佛三昧海经》（卷一）说观佛苦行时白毫毛相云，‘天见毛内有百亿光，其光微妙，不可具宣。于其光中，现化菩萨，皆修苦行，如此不异。菩萨不小，毛亦不大。’”

此外，鲁迅又谈到六朝的“世说新语”的盛行，除了政治的原因，一般名士由于议论政事，受到统治者的迫害，因而“不敢再议论政事，而一变为主谈玄理”，促成了“世说新语”的盛行。同时，与“其时释教广被，颇扬脱俗之风，而老庄之说亦大盛……，终乃汗漫而为清谈”也是有关系的。之后，对明之神魔小说的论述，也有赖于他的佛学知识。

总之，鲁迅对佛经的研究，以及佛学思想

对他的影响,使得他对汉之小说的真伪、六朝小说、世说新语之盛行有了全新的认识,提高了他对小说的研究水平。

第二,佛学的研究和影响,有助于他在文学作品中,塑造鬼怪、僧人形象,籍以揭露现实,寓以理想和希望。

由于鲁迅对报应、地狱之说,别有一番新的认识。即:他认为这种“恶有恶报,善有善报,不是不报,时候不到,时候一到,一切全报”的因果报应思想,正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愤懑,对于人间罪恶的不平,强烈要求得到报复的意愿。他还认为人民群众虽也感到地狱之残酷无状,但“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牲道的罪孽”,所以对于阴间的“严厉、公正”多次赞扬和神往,而且还称颂阎罗天子、牛首、阿旁、马面、无常等鬼魂是“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”,他们“究竟还不失其‘聪明、正直之谓神’”。正因为这样,所以在他写的《无常》、《女吊》等回忆文章中,虽然是回忆往事,但却给我们刻画了一些美丽、正直、富有人情,具有复仇精神的鬼魂形象。如浑身“雪白的一条莽汉”的活无常,则是“粉面朱唇,眉黑如漆”,“蹙紧双眉,捏定破芭蕉扇,脸向着地,鸭子浮水式的跳舞”,又放屁又打嚏,似乎笑又似乎哭,经常发出“硬语与谐谈”的非常滑稽的鬼魂,但他却是个“鬼而人,理而情,可怖而可爱的无常”。还有穿着“大红衫子,黑色长背心,长发蓬松”,“石灰一样白的圆脸,漆黑的浓眉,乌黑的眼眶,猩红的嘴唇”的女吊,则是“带有复仇性的,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,更强的鬼魂。”此外,还有“漂亮的”、“很有些村妇样”的活无常之妻“无常嫂”,穿戴着“小高帽,小白衣”,两肩耸起,“眉毛的外梢也向下”的与活无常惟妙惟肖的活无常之子小无常,以及勇猛矫健的男吊,冷气阴森的死无常等等。这些鬼魂形象都是鲁迅小时在迎神赛会上看到的,都是由工人农民扮演的鬼魂形象,鲁迅刻画这些形象,虽有向人们介绍江浙地方风俗之意,但更多的寓意着他的爱憎、理想与希望。这些鬼魂形象,都是象征着广

大的农民,特别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,都是被剥削被压迫者。鲁迅通过他们表现了对农民深深的热爱之情。同时,也希望他们不要被“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”,宣扬的“‘犯而勿校’;或‘勿念旧恶’的格言”所欺骗,要发扬“报仇雪耻”的精神与反动派斗争到底。与此同时,在文中他把阴间与阳间对比:阳间无公理,而阴间才有“公正的裁判”。把帮闲文人与活无常等鬼魂加以比较:前者耍阴谋,放冷箭,后者知过改过,不掩是非;前者满口“公理”而满心“婆理”,后者大公无私,刚直不阿;前者凶狠无情,后者有情有理;前者是人,“鬼气反而多”,后者是鬼,却“有人情”。在这对比衬托中,否定批判了不合理的黑暗社会,揭露讽刺了那些帮闲文人,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寄予了厚望,对劳动者竭尽赞颂,爱憎是非泾渭分明。

晚年的鲁迅,还曾写过一篇极其有趣的回忆文章,这就是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。文中写了几个下层的和尚,也就是他的师父和师兄。在他笔下的和尚,并不是一心吃斋念佛的道貌岸然、超凡入圣的出家人,而一个个乃是有情趣的追求幸福生活的“俗人”。他的师父“龙师父”是一个交际很广,人也“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”。有一次,他曾“风头十足”的穿着“簇新的海青”,露着“精光的头皮”,“在乡下做社戏”的戏台上,替人家去敲锣。结果引起观众不满,双方由动口到动手,观众人多,他被打逃跑躲避到一个年轻的寡妇家,因而有了家室。这寡妇就成了鲁迅的师母。以后鲁迅又有了三个师兄。“大师兄只有单身,二师兄也有家小”,与他最为亲密的三师兄,后来也“想女人”,“也有了老婆”。当鲁迅逗他三师兄说:“和尚应守清规。”他却有一套奇妙的理论,还大声喝道:“和尚没有老婆,小和尚哪里来!?”这回答使鲁迅当时也“哑口无言,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,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,却从来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。经此一喝,我才彻底地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,以及小菩萨的来源。不再发生疑问。”当鲁迅回想这些趣事时,

还曾饶有趣味地幽默地说：“我想，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，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。”这是鲁迅借此以怀念他的师父、师兄们以及关心师兄们之后代的吧！

总之，鲁迅对佛经的研究，以及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，致使他在文学创作中，塑造了一批美轮美奂，又极富正义感、人情味的男女鬼魂形象，人民大众的“这些信仰，也许是迷信罢，但神道设教，于‘挽世道而正人心’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。况且未能将坏人‘投异豺虎’于生前，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，孔子一车两马，倦游各国以还，抽出钢笔来作春秋，亦此志也。”此外，又塑造了竭力追求人间幸福的他师父、师兄等下层和尚形象，藉以揭露社会的黑暗腐败，不仅世间缺乏亲情温暖，而且出世间更少人情关爱，甚至基本生存条件也难保障。在如此困苦面前，一大批下层僧人（即穿僧衣的农民）还俗，是可以理解的；他们的“犯戒”，鲁迅是同情的。同时，也反映了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倾向。至于社会腐败浸润于佛教内里而引起的变质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对此，鲁迅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。至于像法显、玄奘这些舍身求法的高僧，鲁迅历来敬重，并把他们誉为“中国的脊梁”，是不为过的。因此鲁迅对佛教、佛学的态度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否定中有肯定，批判中有褒扬，并将其有生命力的东西，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。

第三，援引佛教中心思想、典故、语言，旁敲侧击，揭露、讽刺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。

鲁迅曾把地狱比做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社会，把众鬼魂们比做受压迫的人民群众，把军阀比做“神”，把国民党极右势力比做“魔”。说军阀与国民党之战，是“称为神和称为魔的战斗了，并非争夺天国，而且要得地狱的统治权。所以，无论谁胜，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”。又指出国民党极右势力的统治更甚于军阀的统治，他们“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，而且添薪加火，磨砺刀山，使地狱全体改观，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”。可鬼魂们却“得到

永劫沉沦的罚，迁入剑树林的中央”。

他还把历代残害人民、残害进步的统治者比做“火神菩萨”。他“只管放火，不管点灯”，“凡是火着就有他的分”。他只是“作恶”。如秦始皇放火烧书，项羽放火烧阿房宫，罗马皇帝尼禄放火烧罗马城，希特勒放火烧国会等等。而到了现今“进化时代，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（马的前蹄下有个空隙，称为灶门。快马在奔驰的时候，后蹄落地的痕迹在前蹄之前，这种情景叫‘跨灶’。后来把它用做一种比喻，意思是说儿子胜过父亲）的”。国民党极右势力“一场大火，几十路的延烧过去，稻禾、树木、房舍——尤其是草棚——一会儿都变成了飞灰了。”火神菩萨的威风是这样的。可是说起来，他又不承认”。

他又以“净坛将军”指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。——作者注）摇身一变，化为鲫鱼，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”的故事，讽刺吴稚晖、唐有壬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时前后变化的情状。

他还曾以佛教中故事进行文艺评论。如在《柔石作〈二月〉小引》中，形容肖涧秋出走时的心境说：“但是，瞿昙（释迦牟尼——作者注）从夜半醒来，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，于是慨然出家。而霍普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。那么，肖君的决心遁走，恐怕是胃弱而禁食了。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，是由于气质的本然，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。”

作为一个具有科学见识的伟大思想家、文学家鲁迅，他不同于一般的佛经研究者，正如许寿裳所说：“鲁迅读佛经，当然是章先生的影响。……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，对于佛教的思想，归结是不同的：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，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。”也就是说，鲁迅是把佛学影响，即有生命力的东西，融入他的文艺作品中，以此做为社会批评与对敌斗争的武器来使用，这一点，特别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，是很少有人做到的，这也是鲁迅最可贵之处。